

诗人例穷苦 天意遣奔逃*

——苏轼南贬入粤路线图考论

杨子怡

(惠州学院 中文系, 广东 惠州 516007)

摘要: 绍圣元年(1094)闰四月三日,苏轼在知定州任上接到谪贬英州令,立即启程南下赴英州,途中朝廷数改谪令,最后改贬宁远节度使惠州安置。苏轼经过六个多月的长途跋涉,终于在绍圣元年十月二日,到达惠州。苏轼沿途所历,每发为吟咏,留下不少诗文,真实昭示出其南迁路线图和其随缘自适、不以忧戚为怀的心态。

关键词: 数改谪令;南迁路线;潇洒自适

中图分类号: I206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9-8666(2006)08-0003-05

韩愈的“朝为青云士,暮作白首囚”(《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学士》)和苏轼的“诗人例穷苦,天意遣奔逃”(《次韵张安道读杜诗》)等诗句,都道出了封建社会文人的共同命运:晨趋丹陛,夕贬蛮荒。苏轼贬惠州之前,即使犯点事仍受到高太后庇护,故常侥幸得免;其惠州之贬,则标志着他在政治上从此进入了无人庇护的多事之秋。苏轼从绍圣元年(1094)闰四月接到罢定州任令而赴英州南下,途中几经改谪,终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,至绍圣元年十月二日到达惠州,路途经过了长达六个月的鞍马劳顿的奔波生活,备尝艰辛。途中每有所感,辄发为吟咏,留下了不少诗篇。本文以苏轼南贬入粤途中的创作为中心,寻绎其南迁入粤的路线图及当时的心态。

奔逃道路,数改谪令

哲宗元祐八年九月三日,垂帘听政的高太后溘然病逝,举国悲惜,苏轼之悲更甚于别人,因为在元祐前后的八年时间里,他受到高太后的不少保护。因

此他当即写下挽词:“至矣吾三后,功高汉已还。复推元祐冠,盖得永昭全。”^{[1](P1977)}三后谓真宗刘氏、仁宗曹氏及英宗高氏。三后皆垂帘听政,刘氏佑仁宗,曹氏佑英宗,高氏辅哲宗。永昭谓仁宗,因其葬永昭陵。诗赞英宗后高氏继承仁宗明仁二德,故天下思慕。这虽然是臣子们的常例文辞,但却不乏真情。他《与王定国》第三十六简中也写到高氏之逝时自己的悲痛情景:“中外哀慕,想同此悲痛,某蒙被知遇,尤增殒灭。”^{[1](P468)}高氏一死,苏轼兄弟失去了庇护,灾难离他们不远了。九月戊子(十三日),苏轼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、礼部尚书出知定州,且不允许按惯例入宫陛辞,这是其灾难将至的一个明显信号。苏轼已有预感,但他仍不顾个人的安危和前程,积极上疏论事,十五日与范祖禹同上《听政札子》,规劝哲宗循太皇太后之法度而谨守之。二十六日,又上《朝辞赴定州论事状》,劝这个少年皇帝不要任用急功近利之人,不要轻改国策,特别是谈到元祐时期哲宗很少与群臣接触,这无疑触动了哲宗心里

收稿日期:2006-02-27

* 本文为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,编号为:04GH75004。

作者简介:杨子怡(1955-),男,湖南新邵人,惠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。研究方向:古典诗学、唐宋文学。

的隐痛。哲宗在高太后听政期间，对自己当傀儡皇帝的地位早已不满，一直忍耐着，憋着劲要“绍述”先帝的事业，因此苏轼的这些忠言，只能火上浇油，让他心里更反感和忌恨苏轼，这从后来他亲政不到半年，对苏轼一月三次降官的做法就可以看出他对苏轼的不满。

宣仁后一死，哲宗亲政，改元“绍圣”，表明继承神宗朝的施政方针。苏轼知道难共事，主动“乞补外”，以两学士出知定州。时国是将变，轼不得入辞。（《宋史·本传》）^⑩哲宗亲政后的朝廷，新党人物章惇、蔡京出任宰相、执政大臣，他们抛弃了王安石新法的革新精神和具体政策，却把“元祐党人”作为主要打击目标。苏轼兄弟首当其冲，朝中三十多位大臣都被贬到瘴疠蛮荒的岭南等边远地区。绍圣元年四月十一日，殿中侍御史来之邵弹劾苏轼，说“轼凡作文字，讥斥先朝，援古况今，多引衰世之事，以快仇怨之私。”^⑪（P143）于是罢去苏轼端明殿学士、翰林侍读学士，依前左朝奉郎出知英州。范纯仁上疏“乞贷苏轼，不听”，时宰有意欲置之死地，正如黄山谷所云：“子瞻谪岭南，时宰欲杀之。”^⑫可见当时苏轼处境是很危险的。四月十三日，侍御史虞策又奏：“苏轼既坐讥斥之罪，犹得知州，罪罚未当。”^⑬（《长编拾补》卷九本日记事，P141），认为处分太轻，于是又降职为充左承议郎，仍知英州。《宋史·本传》中所谓“遂以本官知英州，寻降一官”即指此。绍圣元年（1094）闰四月三日，除命下，正式罢定州，苏轼按例写“谢上表”离定州赴任。

从此，苏轼踏上了奔赴贬所英州的路程。其路线是：过真定、临城至邢州，到滑州上状乞往汴泗之间舟行；然后过韦城，渡黄河，有“灵槎果有仙家事，试问青天路短长”（《黄河》）的诗句抒愤；不久抵汝州，与其弟辙会晤，题诗汝州龙兴寺。据《文集》卷六十《与参寥子》第十三简记载：“子由分俸七千，迈将家大半就食宜兴”。又《晚香堂苏帖》也说：“迈往宜兴，迨、过随行。”可见，此时苏轼经济已拮据，以至子由分俸助其子安家，长子定居江苏宜兴，迨、过等同行南下。接着苏轼过泗州、高邮、扬州，少住仪真。

同年六月甲戌（初五日），朝臣来之邵等人仍不肯放过苏轼，又向朝廷上谗言，说苏轼自元祐以来多託文字讥讽先朝，虽已责降，但责之太轻，未能压服舆论，尚未到英州的苏轼因此又被改贬为建昌军司马。当时苏轼尚未接到改谪令。六月七日，苏轼泊舟金陵，会晤了钟山法泉佛慧禅师，法泉说偈，苏轼题诗为谢，他在诗中写到：“今日江头天色恶，骰车云起风欲作。”^⑭（P2031），这不是对其仕途风波大作的很好描绘么！可是达观旷达的苏轼，能坦然面对这些仕途

上的风风雨雨，这就是他的人格魅力之所在。他出金陵过慈湖夹，路阻大风，他写下了《慈湖夹五首》，其五是这样写的：

卧看落月横千丈，起唤清风得半帆。

且并水村欹侧过，人间何处不巉岩。

“卧看落月”、“起唤清风”何等旷逸胸怀！第三句化用杜子美《阆水歌》“巴童荡桨欹侧过，水鸡衔鱼来去飞”诗意，写出了水村美好的幽静景色，至于有覆舟之险的大风大浪，在苏轼看来，好似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，因为这比起他人生所历的巉岩来，又算得了什么，这点风波不过“欹侧”而过罢了，作者是何等的洒脱。饱经政治风波的苏轼对仕途上的险恶，是有清醒认识的，他在《过高邮寄孙君孚》诗中就曾经说过：“我行忽失路，归梦山千重。……宦游岂不好，毋令到千钟”。王文诰注解该诗时说：“自伤其行止蹭蹬，如失路也。”^⑮（P2029）因此，他不无沉痛地说，作官不要作到千钟，位高则危。尽管如此，他仍能坦然面对“人间万里风”。以后，他在漫长的岭南生活中，就靠这种旷达乐观的人格精神在支撑着自己。

慈湖夹苏轼因风受阻，来到姑熟。六月二十五日，苏轼正式得到谪贬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的诏令，于是命苏轼归阳羨（今江苏宜兴）从苏轼居住，自己独自携幼子苏过及妾朝云继续南下赴惠州。这可从他由金陵赴当涂路上所写的《书六赋后》得到证明：“予中子迨，本相从英州，舟行已至姑熟，而予道贬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，不可复以家行。独与少子过往，而使迨以家归阳羨。”^⑯（P1652）苏轼《文集》卷五十三《与陈季常》第十六简也谈到自己“自当涂闻命，便遣骨肉还阳羨，独与幼子过及老云并二老婢共吾过岭”的事。建昌军在江南西路，治所在今江西南城。不到半载居然数改谪令，政敌手段之狠毒，哲宗对其厌恶之情于斯可见。

八月初渡彭蠡湖，至吴城山望湖亭，面对烟波浩渺的彭蠡湖，想起自己的仕途坎坷，他感慨万千，写下了《望湖亭》诗：

八月渡长湖，萧条万象疏。

秋风片帆急，暮霭一山孤。

许国心犹在，康时术已虚。

岷峨家万里，投老得归无？

渡“长湖”即渡彭蠡湖，彭蠡湖邻接南康、饶州、隆兴，烟波浩渺，故称“长湖”。秋风瑟瑟，万象萧疏，波涌片帆，霭绕孤山，此种景况寄寓了作者受贬以来的多少酸楚，多少飘泊无依之情！投荒万里，家山何在？归期何在？仅管如此，苏轼报国之心犹在，康时之志犹在。从“八月渡长湖，萧条万象疏”之句和稍后过惶恐滩所写的题有“八月七日，初入赣”的诗，可见八

月初入赣的时间应是准确的。不久过庐陵（江西吉安）。从《宋大诏令集》卷二百六《苏轼散官惠州安置制》《苏轼到惠州谢表》《宋史本传》及苏辙为其兄所写的《墓志铭》等材料可见，大约是在此时他又接到再贬宁远军的谪令。王文瀾《案》就持此说：“八月再贬宁远军节度使惠州安置，不得签署公事”。宁远军属广南西路，治所在现今的湖南宁远。这是他被安置惠州时的最后虚衔。半载时光，窜奔道路，居然一贬再贬，朝廷反复无常如此，真亘古未之有也。

在庐陵苏轼见到曾安止，安止拿出所作《禾谱》，苏轼惜其不谱农器，于是作《秧马歌》附其末。在歌中歌颂秧马效率高，节省劳力。秧马是农民栽秧之器，这是作者在湖北时所见农器，苏轼在《题秧马歌后》其四中说：“吾尝在湖北，见农夫用秧马行泥中，极便。顷来江西，做《秧马歌》以教人。”（P584）很明显，苏轼写秧马歌的目的，就是要让其易诵易背，以推广之，后来，苏轼在惠州达到了推广秧马这一目的。

八月七日，苏轼乘船由水路来到著名的惶恐滩。惶恐滩是在吉州万安县到虔州（今赣州）的境内，赣水流经这里，水急地险，巨石林立，有十八险滩。面对惶恐之滩，联想自己的千里投荒，作者浮想联翩，写下了著名的《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》诗，诗云：

七千里外二毛人，十八滩头一叶身。
山忆喜欢劳远梦，地名惶恐泣孤臣。
长风送客添帆腹，积雨浮舟减石鳞。
便合与官充水手，此生何止略知津。

以垂暮之年，长途跋涉七千里；以一叶之身，泛舟十八惶恐滩头，该有多少辛酸，多少凄楚！但正如纪昀对该诗所评价的“真而不俚，怨而不怒。”（P2053）作者把怨而不怒的真情寄寓在山水的描述之中。出惶恐滩后，来到虔州（属南康军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，勾留十日，在这里，登郁孤台，游天竺寺，谒祥符宫，入崇庆院，与虔州守黄元翁、通判俞括及虔州士大夫诗酒交游，受到了好客的虔州人民的热烈欢迎，留下了不少的诗文。在这里还与后来知惠、与他交往甚深的方子容（南圭）不期相遇。这段生活是他南贬以来最欢愉的时光，正如他后来《与方南圭》简中所云“废逐之余，始获倾盖赣上，欢愉平生。”（《晚香堂苏帖》）（P1169）在这段时光里，他所写的诗往往借幽美的山水表现出他轻快的心情，如其《郁孤台》诗中所写到的：“八境见图画，郁孤如旧游。山为翠浪涌，水作玉虹流。……烟云侵岭路，草木半炎州。故国千峰外，高台十日留。他年三宿处，准拟系归舟。”诗中虽然不免故国之思，但写景高旷开阔，气势不凡。当然，毕竟是万里投荒，因此在他的高旷之中，时存一种零落飘泊之感，如《天竺诗》有感于十二岁

时其父从虔州归，言及天竺寺白乐天当年所题诗，写道：“林深野桂寒无子，雨浥山薑病有花。四十七年真一梦，天涯流落泪横斜。”浮生一梦，天涯流落，旷达如苏轼者，居然也流下了凄楚之泪，这也表达了苏轼情感世界的另一面。

窜身岭海，忘怀得失

苏轼风尘仆仆，备尝艰辛，沿途吃了不少苦头，可他并不以苦乐为念，不以得失为怀。进入蛮荒，环境更苦，如他《到惠谢上表》所说的“但以瘴疠之地，魑魅为邻；衰疾交攻，无复首丘之望”（P523），但其宠辱不惊、生死无虑的旷达潇洒情怀一以贯之。

绍兴元年八月底，苏轼离开虔州，过上犹，经南安，踏上入粤征程。九月初，来到了赣粤的要冲大庾岭。据《南康记》记载：“大庾岭，汉名台岭，岭有石，平如台，形如廩庾。”据说，汉有守将叫庾胜者，筑城岭上，因名庾岭。它和骑田、萌渚、都庞、越岭四岭合称“五岭”。如今，万里投荒的苏轼，站在这古老的驿道上，回顾已走过的路程，瞻望前途，作者不禁感慨万千，在庾岭龙泉寺中的龙泉钟上题下了一首《大庾岭》诗，诗云：

一念失垢污，身心洞清静。浩然天地间，惟我独也正。今日岭上行，身世永相忘。仙人抚我顶，结发受长生。

首先，作者化用《庄子·德充符》中的话：“受命于地，惟松柏独也在，冬夏青青；受命于天，惟舜独也正”。认为自己的浩然正气正像受命于地的松柏和受命于天的舜，“独也正”。然后，作者引用李白流放夜郎《赠韦太守》的诗句，喟叹身世两忘。苏轼以59岁垂老之年，又当此转徙流离之际，而浩浩然无毫发顾虑，非豪放旷达者无以及此，当然作者在旷达之中掩藏的几许凄楚也是存在的。

翻越大庾岭，进入了广东极北的南雄州。苏轼从南雄登舟，沿浈水西行至曲江，然后转入北江顺流南下英德、广州。在滞留韶州时，他曾留宿始兴县东南三里的建封寺，游览了距韶郡南百里的月华寺。然后又游了广东名刹、六祖慧能圆寂的南华寺。在这里留下了不少的题铭和诗作。其《南华寺》诗有句说：“亭亭塔中人，问我何所见。可怜明上座，万法了一电。饮水既自知，指月无复眩。我本修行人，三世积精炼。中间一念失，受此百年谴。”诗中充满禅趣，但又颇有寄意，正如王文瀾《案》引纪昀所说的“触境寄感，不同泛作禅语”，此方是东坡游南华寺，不可移掇他人。方是此时东坡游寺诗，不可移掇平日。此为诗中有人。”（P201）所谓“此时”，当然是指作者万里投荒之时，所谓“有人”，当然是指诗中有苏轼自己。作者此

时的心情，万里投荒沿途的感受，当可由此诗体悟得出。在南华寺他与南华辩老甚是投缘，相交颇深。后来苏轼到惠后，与辩老书信往还十分繁密，辩老也不时地派人馈赠诸物以示关心，苏轼居惠时多次在信中致谢，如《与南华辩老十三首》（P1504）第三简云：“远承差人寄示诸物等，一一荷厚意也。……谪居穷陋，无可为报，益不遑矣。”

九月中旬，苏轼舟行北江抵达英德。英德古称浈阳、真阳、英州（明改为英德），位于北江中部的西岸，正当北江三峡（中宿峡、香炉峡、浈阳峡），水道狭窄，水流湍急，山势奇伟，岩石多姿。清凉道人《听雨轩笔记》曾述：“予昔过其地，曾自南门城上望之，大山如屏障，周遮小山，峰刀矗立，皆英石也。”^[18]在英州他和儿子苏过一同游了碧落洞，并写下了《碧落洞》一诗，后来程正辅还写过次韵诗。苏轼该诗首先描写了碧落洞深邃幽僻、山石竦立的情景：“槎牙乱峰合，晃荡绝壁横。遥知紫阁间，古来仙释并。阳崖射朝日，高处连玉京。”然后暗点出自己忧谗畏讥的心绪：“我行畏人知，恐为仙者迎。小语辄响答，空山白云惊。”所以王文瀾《案》引纪昀语评价此诗说：“隐寄名盛招尤之慨，其词却浑然不露。”确实，从“我行畏人知”、“恐为仙迎、小语防惊”等表述中，不难看出，作者在山水自然景物的客观描写中，不露声色地将自己树大招风、名盛招尤的心态隐隐约约地表现了出来。

出英州后，苏轼继续泛舟南下，九月十三日到达清远峡。清远峡即中宿峡，9公里之长，是北江三峡中最长的河峡，峡口水流湍急，两岸峭壁刺天，群峰兀起，形势奇险。岸北有峡山寺，又名飞来寺，是北江流域著名古迹。它幽渺而又古老的传说为飞来寺的创建平添了不少的神奇色彩：据说六朝梁武帝普通元年（520），舒州（安徽舒城）峡的上元延祚寺突然一夜之中，狂风大作，暴雨如注，延祚寺被刮到了南粤的中宿峡，途中，经过大庾岭时，被大庾岭碰触了一下，因而缺了一角，所缺一角也就成了大庾岭的云封寺，因之又名掛角寺，吹到中宿峡的部分自然被称为飞来寺。寺中的飞泉亭是清代所建，它的原址当为苏轼峡山寺题诗中所写到的淙碧轩。飞来寺美妙动人的传说，幽静美好的景色，对平生酷爱山水的苏轼来说，自然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。因此他携儿子苏过一同游览了飞来寺，并在《峡山寺》一诗中把自己所看到的美好景色真实地记录下来：“天开清远峡，地转凝碧湾……云碓水自舂，松门风为关；石泉解娱客，琴筑鸣空山”。如此美妙之景自然使人流连忘返，自然使人难以忘怀，后来到了惠州贬所的苏轼还不能忘情于这次飞来峡之游，在《次韵高要令刘湜峡山寺见寄》诗中再一次描写了飞来峡的壮观景色：“遥

知清远峡，不称空洞腹。蹇驴步武碎，短瑟弦柱促。仰看泉落佩，俯听石响谷。千峰泻清驶，一住无回躅。……”总之，苏轼这次游清远峡，兴趣盎然，鞍马劳顿之苦，待罪投荒之忧，悄然冰释，他又是写诗，又是题字，并且为当地山水景观的规划和改善出谋划策，旷达潇洒的生性和本怀又不禁自然流露。

在清远舟中，苏轼写下了寄湖州贾收（耘老）的诗，诗中也表现了作者人生如寄的思想：“人生百年如寄耳，七十朱颜能有几？有子休论贤与愚，倪生枉欲带经锄。天南看取东坡叟，可是平生废诗书。”^[19]（P2557）人生如蜉蝣寄于天地，有子休问贤与愚，受业孔安国的汉代儒生倪宽，贫而不能自养，带经而锄，亦有何益，因此我这个东坡叟平生也就拟废诗书了，字里行间自有几许不平之慨。舟行至清远县城，遇到清远乡贡顾纯甫（即顾秀才），极谈惠州风物之美，即兴写下了《见顾秀才》的诗，表达了对惠州对罗浮山的神往：“恰从神武来弘景，便向罗浮觅稚川”。苏轼虽还未到惠州，但从顾秀才的介绍中，惠州在他心目中就留下了美好的印象，认为“此邦宜住玉堂仙”。

大约在九月二十五日左右，苏轼到达广州，此时他弟弟苏辙到达贬所筠州（今江西高安县）。在广州他拜访了崇道大师何德顺，何德顺向苏轼谈及女仙降及其室，赋诗立就的事，苏轼为其题《广州女仙》的题记。在广州他还会晤了广州推官浙江人程全父（天侔），成为诗文之交，后来苏轼居惠期间，两人有过八次书信往返。此外，他也结识了时为广州通判的谭揆（文初），居惠时（绍圣四年三月）他还应邀为谭文初书《金刚经跋尾》，赞扬了谭文初的“孝慈忠信，内行纯备”（《苏轼文集》卷六十六）（P1644）。在广州的这段时间里，他还携幼子苏过一同游览了白云山、蒲涧寺、滴水岩等名胜之地，这里山林茂密，泉水叮咚，风景十分幽美。作者兴致勃勃，写下了《广州蒲涧寺》《赠蒲涧信长老》《发广州》等诗。在《发广州》一诗中他写道：

朝市日已远，此身良自如。三杯软饱后，一枕黑甜余。蒲涧疏钟外，黄湾落木初。天涯未觉远，处处各樵渔。

诗写自己从广州出发，越走越远离朝市，长途的奔波，并没有减除他的兴致，他自觉如汉代的李广将军一样，意气自如。三杯下肚，酩酊一枕。酒酣之中，蒲涧疏钟，黄湾落木，时间于耳，处处樵歌渔唱，为我远行人送行，此情此景，岭外天涯，何言之远！年来鞍马劳顿之苦，数月三迁的重谪之忧，被岭南的美好山水，一扫而光，旷达潇洒的本怀又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。

苏轼离开广州，乘船经过扶胥，登上浴日亭赏景。据《广州志》载：浴日亭，在扶胥镇海神庙之右，小山屹立，亭冠其上，前瞰大海。夜半，日渐自东海出，故名。“浴日亭就在今广州市黄埔区东圃，因它位于南海菠萝庙前，故又称‘菠萝浴日’”。从浴日亭远眺，扶胥江南接黄埔，东望狮子洋。远道而来的苏轼被眼前的美景所陶醉，他登高临海，胸襟豁然，写下了《浴日亭》一诗。南宋的刘克庄和明代广东著名学者陈白沙都曾追和过该诗。现录苏轼的《浴日亭》诗如下：

剑气峥嵘夜插天，瑞光明灭到黄湾。
坐看暘谷浮金晕，遥想钱塘涌雪山。
已觉苍凉苏病骨，更烦沆瀣洗衰颜。
忽惊鸟动行人起，飞上千峰紫翠间。

作者首以“剑气”、“瑞光”、“金晕”状日千呼万呼未出之景，末以红日喷薄、惊动栖鸟、催人早行形日始出之状。如此美景让鞍马劳顿、病骨峻峭的东坡得以苏息，山中之仙气让他一洗千里投荒、路途迢递之衰颜，真有仙人的“春食朝霞，夏食沆瀣”（刘向《列仙传》）之感。面对苍苍凉凉的初出之日，一切痛苦忧虑都已冰释。可见，苏轼虽然宦海浮沉，备受打击，千里投荒，备尝艰辛；但沿途有不用租借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的美丽风光与他相伴，南国的风情给予他心理上的慰藉，给予他精神上的支撑。杜子曾有诗说：“一重一掩吾肺腑，山鸟山花吾友于”（《岳麓山道林二寺行》），老杜的爱山水、爱生活人所共知，苏轼沿途而来不也是把一重一掩的山麓楼台当作自己的肺腑么！不也是把花鸟草虫当作自己的兄弟么！苏轼正是凭了这种对大自然的挚爱和对生活的挚爱，所以，他能坦然面对挫折，他没有像韩愈当年贬潮州那样，表现出太多的忧谗畏讥的心态。甯身南荒，却“不辞长作岭南人”（苏轼《食荔枝》）；人生处逆处顺，不过如鱼挂钩、脱钩而已，他表现出万人莫及的洒脱本性。

离开广州后，苏轼乘舟沿东江而上，于九月二十六日抵达泊头镇（今东莞石龙镇），之后改乘小船折小溪经泊头圩出陆，二十七日到达罗浮山，与儿子苏

过一同游览了罗浮山。十月二日到达贬所惠州。到达伊始，马上例行公事地向皇帝写了《谢上表》。听到苏轼贬惠州时，同里博士唐子西写下了《闻东坡贬惠州》的诗，对苏轼表示景仰，并对他的遭遇抱不平，可是没想到十三年后他居然也被贬到惠州，历史竟是如此地巧合，荒僻之隅，皇恩浩荡，竟为惠州人民送来两位奇才，所以，南宋刘克庄写诗说：“一州两迁客，天地顿奇才。方送端明去，还迎博士来。”端明即指苏轼，因苏轼曾任端明殿学士，博士指唐庚（字子西），他曾于元祐初举进士第一为博士。

苏轼从绍圣元年闰四月离定州任南下赴贬所，至绍圣元年十月二日到达惠州，长达六个月的长途奔波劳顿生活终于结束，从此开始了两年又七个月的惠州贬居生活。惠州属广南东路，治归善县，辖归善、河源、博罗、海丰四县。这里人文荟萃，离广州较近，交通比起韩愈当年所贬的潮州来应该便利多了。因此，尽管因逐臣之身而致行动不自由，有时甚至不免有对宵小构陷的戒惧，但毕竟天高皇帝远，坦然旷达的本性，使他能坦然面对困顿的处境，虽然有时也会时不时地发出“中原北望无归日，邻火村春自往还”（《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》其一）叹惋，但总体而言，近三年的惠州贬谪生活，苏轼是潇洒以对的，他饮酒、看花、钓鱼、品茗、谈经、研佛、寻幽、觅句，在日常潇散的生活中寻找生命的真谛，冰释自己的仕途困蹇和悲忧。

总之，苏轼南迁之中，每有所遇辄发为吟咏，留下了不少诗文，这些诗文清楚地昭示出了他的南下惠州的路线图，是他南下岭海行迹的真实记录。这些内容丰富的诗文，也记录了他南下途中的种种情感体验。从这些诗文中，我们可以洞烛苏轼真实的内心世界，可以感受到苏轼面对逆境而坦然处之的人格精神和文化个性，他是与韩愈不同的另一类古代知识分子典型，他的潇洒达观、随缘自适，不以得失为怀的带有庄禅特征的品格，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范型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苏轼. 苏轼诗集[M]. 孔凡礼点校. 中华书局中华书局 1982.
- [2]曾枣庄, 舒大刚. 三苏全书(第12册)[M]. 北京: 语文出版社, 2001.
- [3](元)脱脱等. 宋史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7.
- [4]孔凡礼. 苏轼年谱(下)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8.
- [5]黄宝华. 山谷诗集注·卷十七·跋子瞻和陶诗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3.
- [6]苏轼. 苏东坡全集(第6册)[M]. 珠海人民出版社, 1996.
- [7]曾枣庄, 舒大刚. 三苏全书(第13册)[M]. 北京: 语文出版社, 2001.
- [8]朱玉书. 苏东坡在海南[M]. 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1993.